

# 论影响慈善事业发展的四大因素

张奇林

慈善事业是一个历史范畴。尽管关于慈善事业的起源有不同的说法，慈善事业在不同的社会形态和社会制度下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从本质上讲，慈善事业是一种救济行为，施惠者与受惠者是慈善事业的两个基本要素，这对不同时代和不同民族的慈善事业来说，具有普遍意义。其中，慈善捐献（常表现为善款、善物、义工等形式）是慈善事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而在人的生命周期中出现的生、老、病、死以及社会变迁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使社会上总存在着众多的需要救助的对象，即使是社会保障事业高度发达的今天，任何一个政府也不可能全部救助这些芸芸众生，慈善事业便以其社会化的方式，发挥救助功能，成为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必要补充，这便是慈善事业的历史定位。对古今中外的慈善事业进行综合研究，不难得出一些规律性的认识，这对深化慈善事业的研究和发展中国特色的慈善事业不无帮助。本文试就影响慈善事业发展的几个主要因素作一分析和论述。如能对这些因素善加利用，我国现阶段的慈善事业将会上一个新台阶。

## 一、道德因素

慈善是一个道德范畴。当然，这并不是说所有的捐献者都出于道德的驱动，或具有较高的道德境界，但没有道德基础的慈善事业是不可想象的。特别是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道德对于现代慈善事业的发展，意义就更为重大了。因为，发展现代慈善事业的首要任务是培养公众的慈善意识，而慈善意识的培养又取决于一个社会的道德水准。道德是一种经过历史积淀的行为规范，具有导向性和约束力。尽管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但在人类历史上不乏优良的道德传统，这是我们应该珍视的文化遗产。它体现在慈善事业方面，则主要包括人类历史上丰富而久远的社会慈善思想和人道主义精神。

中华民族是一个热情仁爱、乐善好施的民族，敬老爱幼、扶贫帮困已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道德规范。有人将此视作慈善事业的最早发萌。与此相映成趣的是，我国的慈善思想渊源流长，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对此有过精辟的阐发。

儒家鼻祖孔子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人本主义思想体系。他说：“仁者人也”，认为道德是人的最高本质。那么，何为“仁”？《论语·颜渊》记道：“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孔子以“爱人”释“仁”，将能“爱人”作为人的一种本性，无疑是对氏族社会原始人道主义观念的回归和发挥。孔子还向人们描绘了人与人之间以仁爱为价值原则的，具有原始共产主义特征的理想的大同社会，即《礼记·礼运·大同》中所描绘的：“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人类社会至今还在向这个目标奋斗。

孔子衣钵的继承者孟子在“仁”的基础上，提出了“仁政”的主张。他说，“不忍人之心，

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侧隐之心，仁之端也”。他认为，侧隐之心，不但为行“仁政”之始，也是每一个人的行为准则。基于“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精神，孟子又提出了“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的社会互助观。对于仁政措施，孟子又说：“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他还以伯夷为例，说明何谓“善养老”。由此可见，孟子更多地注重仁爱的实践意义。

从孔子到孟子，从仁政到仁术，形成了系统化的社会慈善思想。汉代“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孔孟之道得以继承和发扬。从韩愈的“博爱”到张载的“民胞物与”，仁爱思想一脉相承，并得到发扬光大，对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构建和慈善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先秦诸子百家中，另一有代表性的慈善思想是墨子的“兼爱”思想。墨子主张“兼相爱”，“交相利”，提倡“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进而，“多财，财以分贫也”，“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若此，则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sup>10</sup>。芸芸众生安居乐业，天下太平。墨子兼善天下，苦难力行的精神，体现了一种乐善好施，积极参与的慈善风范。

不难看出，以拯救世道人心，济贫扶弱为基本内容的中国传统的慈善思想的理论基础是建立在“仁爱”思想之上的人道主义精神。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道主义具有极其强烈的实践性特征。中国的历史典籍告诉我们：政府机构在救灾赈荒，抚恤病残等社会保障方面，居于主导地位，而民间慈善事业却不甚发达，这种历史的特殊性与儒家思想的若干特质相关联。政府机构所发挥的功能，无疑属于中国传统的人道主义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也就是说，人道主义推动了中国慈善救济事业的发展，这是毋庸置疑的。

在西方，也有类似的慈善思想。古希腊的幸福论认为，幸福来自与人共享，因此，富人应该提供一些财富给穷人，这样，才深觉愉悦。古罗马强调责任观，认为富者为穷人解决痛苦是宗教上一个重要的责任；同时，要使受赈者不失其尊严，富者也因施赈而益显尊贵。

但真正对世界产生影响的是西方的人道主义，也就是我们现在在一般意义上所说的人道主义。它孕育于西方文化，尤其是欧洲文艺复兴以来法国启蒙思想家所揭橥的那一套思想理论。它强调以人为本位，肯定人的价值，维护人的权利，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即是这种精神的反映或要求。人道主义在世界上广为传播，占据着思想领域的主导地位。在此基础上，慈善事业走向世界才有了可能，国际人道主义援助也得以开展。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固有的人道主义思想体系与西方的人道主义虽然在许多具体原则上是相通的，但在文化形态上毕竟存在差异，二者在价值上互补，但不可相互替代。我们提倡批判地继承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的文化遗产，但坚持民族性是第一位的。同时，“一切已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sup>11</sup>。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如何重建社会主义的道德体系，用以指导和发展新时期的慈善事业，是一个不容回避的课题。1986年12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指出：“在社会生活中，要大力发扬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精神，尊重人、关心人，特别要注意保护儿童，尊重妇女，尊重老人，尊重烈军属、荣誉军人，关心帮助鳏寡孤独和残疾人。”1996年10月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在全社会形成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共

同前进的人际关系。”这两个决议将社会主义的道德建设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中国发展新时期的慈善事业有了坚实的道德基础和强大的动力。

## 二、宗教因素

在中外慈善事业史上，宗教对慈善事业的驱动讳莫大焉。在中国，对慈善事业影响最大的宗教当属佛教。

佛教于东汉传入我国，佛教寺院乍一建立，济贫事业就发展起来。东汉时期佛教寺院的济贫事业相当发达，这是我国最早的民间慈善救济事业。寺院和僧侣用来从事慈善事业的寺院财产中最大的一个来源是社会人士的捐施，这说明佛教对世道人心的影响之大。佛教教义中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慈善思想。现择其要者叙述如下：

第一，布施。大乘义章十一回说：“言布施者，以己财事分与他，名之为布。己惠人，名之为施。”这种宽宏大量，给人方便等于给己方便的做法，自己终会从中得到福报。第二，福田。它以农民播种于田，有秋收之利作比喻，劝导世人，只要多行善于前，将受诸报于后。福田观是佛教教义中最有影响力的思想，推动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慈善实践。唐宋时期的悲田养病坊、福田院等慈善机构即因此而得名。第三，慈悲。所谓慈，梵文中为真实友情、纯粹亲爱之意；悲为哀怜、同情之意。大智度论曰：“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佛教劝导世人发大悲之愿而生救世之心，对于赈济、育英、养老、医疗等济世事业，常视为发大悲之心的外化行为。第四，放生，就是戒杀。它被演绎为平等说和轮回说，即一切众生平等，当不可杀；一切众生都可能是自己前生的父母兄弟姊妹，更不可杀。所以放生之慈悲，可拔苦与乐。以此引申，其对于济贫扶倾，救灾救人视为当然之事。第五，报恩。佛教提倡四恩说，即三宝恩、父母恩、国王恩、众生恩，主张一切众生平等，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慈善观念，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思想交相辉映。<sup>12</sup>

佛教慈善思想的核心是行善的功德论，有极其浓厚的“福报”、“修福”的观念，对社会上的一些富人有很强的吸引力。因此，汉唐佛教寺院的财产一直非常丰富，寺院慈善事业长盛不衰，主要包括济贫、赈灾、医疗、戒残杀、宣传慈善事业等方面。宋代以前的民间慈善事业大多由寺院僧侣和佛教信徒从事。新儒学兴起后，这一状况才有所改变，个人慈善事业逐渐普及。

佛教推动了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对社会心理起到了一定的净化作用，但也产生了消极影响，那就是迷信思想的滋生，在人们的观念中培植了祸福之见。对此，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之创为慈善事业者，类多由于迷信祸福之深”；“中国人先有一祸福之见存，而慈善之事业，实缘此祸福之心而起，故其为慈善之行也，恒以祸福为本位，而慈善之事业，乃不啻为此祸福之刍狗焉。”<sup>13</sup>不可否认，这种祸福之见的消极影响至今仍未消弥，它是对佛教慈善思想的一种歪曲。也就是说，佛教教义中所蕴含的慈善思想本身无可指责，如果能正确引导，善加利用，将对当今的慈善事业产生积极作用。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在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同时，要注意培养理性的宗教徒；另一方面，要对不良的社会风气作坚决斗争，杜绝慈善资源的流失和浪费，保证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

在西方，宗教的影响更是无处不在，以至有学者指出：“西方立国在宗教”。<sup>14</sup>基督教的经典《圣经》说：“当爱你的邻舍”，就是劝人应当用善意爱众人，对遭遇不幸和生活困苦的人，均应施以怜悯的爱心；它还特别强调社会工作者应具有奉献的爱心与谦卑的态度。西方慈善事业的盛行与发达，与基督教的影响不无关系。现代意义上的慈善事业就始于教会慈善事业，

至今仍有不少冠以教会名称的慈善机构。

不论佛教，还是基督教，都提倡利他、奉献、博爱与救人救世的精神以及以爱心助人与人为善的风范，但它们对本国慈善事业的影响程度却不尽相同，这种差异是由文化形态的差异决定的。但不管怎样，它们对于建立一个美好的世界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我们应当吸收和继承。

### 三、经济因素

关于慈善事业的产生，有一种观点认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财富的增加，人们的收入差距开始拉大。当社会收入差距拉大时，对慈善事业的需要就出现了。也就是说，慈善事业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如前所述，慈善捐献是慈善事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而慈善捐献又取决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只有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使一部分人能够拿出一部分财富去救助不幸的人群时，慈善事业才有可能产生。至于这部分人愿不愿意，或外部力量允不允许他们进行救助，那要视其他因素而定。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这里也能找到注解。

近代典型的慈善事业产生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首先发萌于欧洲不无关系。新中国成立后，慈善事业在我国销声匿迹，这一现象的产生，除思想认识上的误区外，社会生产力的低下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也是重要原因。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社会收入差距也逐渐拉大，社会慈善事业应运而生。尽管社会主义本质是消除贫富分化，但我国目前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且在短时间内不可能消除贫富分化，这就决定了社会慈善事业必须长期存在，大力发展。同时，我国现阶段的国情国力还决定了我们在发展新时期的慈善事业时，既要学习国外的经验，更要坚持民族性和社会主义方向，走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进入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后，随着贫富分化的消除和共产主义道德的形成，慈善将成为人们的一种自觉行为。

一般来说，施惠者是社会经济利益的受益者，他们通过慈善的途径去救助不幸者，从而达到一种社会公平。这是效率与公平的理想关系。但实际上，在效率与公平的取舍中，往往是效率优先，兼及公平。经济利益对慈善事业的影响就说明了这一点。

慈善事业是一项充满爱心，不求回报的公益事业，但经济利益的驱动，有时使这项事业声名狼藉。在中国古代，常有一些官吏和社会人士借救济之机或管理常平仓、义仓之便，中饱私囊，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它也常成为人们批判旧式慈善事业的有力证据。在基金会众多的美国，基金会的发展固然推动了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进步，但难免鱼目混珠，一些私人基金会打着慈善事业的招牌为大资本家谋取私利。这些弊端遭到了社会舆论的严厉抨击，反对基金会“干坏事”的呼声日益高涨，一时间，基金会成了万夫所指。

可见，利益驱动对慈善事业造成的不良影响，古今中外皆难以避免。但由此否定慈善事业，以致因噎废食，显然是不可取的。而且现代慈善事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经济利益的驱动。因为，慈善事业是以社会成员的自愿捐献为经济基础，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总是要追求利润最大化，要想让公众将财物从口袋中掏出来投向社会慈善事业，光靠道德的说教和宗教的劝导，显然是不够的，这就需要制定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向慈善事业倾斜，使捐献者有利可图，从而将一部分社会财富投向慈善事业。

可见，利益驱动既能推动慈善事业的发展，又可往慈善事业脸上抹黑，这就要求政府既要建立可行的激励机制以吸引捐献，又要有完备的约束机制来规范慈善事业的运作，这样才

能用好利益驱动这把双刃剑，使慈善事业名符其实造福于民。

目前，一些国家和地区主要通过税收政策来吸引资金从事慈善事业，同时还建立了严格的审查和监督制度。在美国，非营利机构占全美机构总数的6%，美国政府认为，既然这些非营利机构是帮助政府为社会工作的慈善组织，所以经审定为免税机构后，都应予以免税。尽管私人性质的基金会和公共筹款机构同属联邦税务总局批准的免税组织，但根据有关税法，对公共筹款机构比对私人基金会的待遇要优越得多。同时，美国税法还规定，任何非营利组织，只要经营与该组织的慈善事业无关的活动或事业，就必须按照公司所得税法对其收入照章纳税。在香港，税法规定：如任何机构和个人每年慈善捐款超过100港元，则可在息税和利得税中扣除相等款数。为了防止少数人借慈善捐款之名行逃税之实，就需要对“慈善行为”进行严格界定。根据香港法例第112章《税务条例》规定，只有当受捐人是政府认可的慈善机构或信托团体时，捐款人才能享有相应的优惠。至于哪些机构属慈善团体，以政府每年在宪报上公布的名单为准。而要想成为慈善团体，则必须经过税务机关的严格评审，只有是以往的所有开支都被认定用于慈善事业时，该团体才有可能获评为慈善机构。在我国有些城市，也有类似的优惠政策。如上海市在税收上对慈善事业进行倾斜，政策规定，作为慈善捐款所得税个人可免30%，这样，捐献者不仅能获得应有的社会声誉，还可以得到必要的经济补偿。上海慈善基金会目前已筹集资金4200万元，占全国慈善基金总额的50%，上海市慈善事业之所以发展较快，与这样一些政策不无关系。目前，我国的慈善事业才刚刚起步，各项政策和制度尚不健全，采他山之石，发展本国的慈善事业，极有必要。

此外，利益原则对慈善事业内部的资金投向也有很大影响。慈善事业是以捐献者的意愿为实施基础的，慈善组织在实施慈善项目时，必须遵循捐献者的意愿。易言之，捐献者有权力将其捐献的款物用于其指定的慈善项目甚至具体的救助对象，只要这些用途是正当的慈善行为。因此，捐献者对慈善项目的选择决定了慈善事业的资金流向。现代慈善事业的发展表明：利益原则对慈善项目选择的影响越来越大。在美国，私人基金会长期忽视对人文社会科学的资助，而将大量资金集中投向教育和科学技术领域，就是因为人文社会科学的许多项目很容易侵害基金会及其老板的利益。基金会对慈善项目的选择固然同其创建者、控制者的慈善观有关系，但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利益原则。纯粹的利他主义在基金会中是不存在的。<sup>15</sup>

近十年来，公司慈善业成为一种时尚和趋势。它集中体现了利益原则对慈善事业的影响。所谓公司慈善业，就是将公司的慈善活动纳入公司肌体，使其成为公司经营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为社会进步作贡献的同时，也使公司的形象和利益得到改善。但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公司滥用这这种方式，他们以慈善为幌子，参与一些公益活动，以转移政府和人民对公司某些不正当活动的注意。因此，只有树立“公司公民”的观念，坚持社会效益优先的原则，将社会利益真正融入公司的企业职能中，公司慈善业才能为社会进步作出有效的贡献。<sup>16</sup>

#### 四、政治因素

政治因素对慈善事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政府对慈善事业的干预。由于种种原因，不同的政府或同一政府在不同时期，干预的形式和程度不尽相同。以美国为例，在现代基金会诞生后的百年中，美国政府对基金会的政策作过多次调整，经历了从自由放任到鼓励、扶持，再到干预、限制的过程。目前，美国政府对慈善事业进行宏观控制的主要手段是税法。这一系列调整，一方面反映了美国慈善基金会的发展轨迹；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美国社会对慈善事业认识的加深，要求政府对慈善事业加强管理。

慈善事业在近现代和当代中国的发展命运则更为典型地说明了政治因素对慈善事业的影响。随着欧美列强的入侵，近代慈善事业传入中国。由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特殊性，中国的慈善事业从一开始便带有明显的半殖民地化特征，呈畸形发展态势，主要表现在：第一，政府对慈善事业缺乏有效管理。尽管历届旧政府均设有机构管理慈善事业，但大都有名无实。第二，中国人开办的慈善机构大都来自外国人的影响，而且比外国人开办的少得多，水平也有一定的差距。第三，慈善组织大都是临时救济性的，缺乏长远发展目标，善款短缺，管理混乱，自生自灭，旋生旋灭。第四，一些慈善组织，特别是外国人开办的慈善组织，假慈善之名，干着不慈善的勾当。种种弊端，皆由当时的社会性质所决定。

新中国成立后，慈善事业被视作封建毒素和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被扫地出门。对慈善事业的完全否定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达到了极点。由于政治导向的失误和政治运动的冲击，慈善的概念逐渐淡化，慈善事业在人们的心目中俨然成了不那么慈善的东西，以至 40 多年来，慈善事业在我国一直无人问津。同时，由于公有制对民间慈善事业的排斥，慈善事业的功能则完全被政府所接纳和包办。因此，在慈善事业不复存在的岁月里，政府所办的社会福利事业却有了相应的发展。据统计，至 1993 年底，全国有社会福利院 969 所，社会儿童福利院 67 所，加上社会办的敬老院和其他收养性福利单位，合计共有机构 4218 个，收养人数达 601510 个，其中老人 584070 个，少儿 17440 个。<sup>17</sup>如此庞大的社会福利事业主要靠政府和集体来办，私人办的几乎没有。进入 80 和 90 年代，人们开始思考：这么多的事情只靠政府来办行不行？

改革开放后，思想认识的解冻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为慈善事业的复兴提供了契机。有人研究，中国重新以慈善名义开展活动是 1992 年的事，几年来，慈善事业在我国的发展呈现方兴未艾之势。主要表现在：第一，社会慈善意识增强，各种慈善行为大量存在。第二，民间慈善组织增多，全国已有 22 个省市成立了 30 多家慈善会。第三，政府不仅倡导、扶持慈善事业；一些政府机构还直接参与慈善事业，接受各界捐赠。目前，我国的慈善事业正在探索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

在影响慈善事业的诸因素中，政治因素的作用最直接、最明显，甚至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力。由于政治的影响，导致慈善事业的畸形发展，乃至消失，是一件很不幸的事。

慈善事业是为了救助苦难的人群而发展起来的一种爱心事业，一般来说，一个社会慈善事业的发展水平反映了这个社会的发展状况。具体而言，它一方面反映了这个社会的问题的多少，另一方面又反映这个社会自我调节能力的大小。这两个因素的互动决定了社会的走向，也决定了慈善事业的地位和作用。综观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慈善事业是一项不可或缺的社会事业。同时，它又是合力作用下的产物，因而，在时空上呈现出多样性。如何把握慈善事业的发展规律，正确引导和妥善利用影响慈善事业发展的诸因素，走一条既有民族特征，又有时代特征的发展道路，是发展我国慈善事业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

#### 注释：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1 版，第 20 卷，102 ~ 103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论语·公冶长》，《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 189，四书类。

《孟子·公孙丑上》，《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 189，四书类。

《孟子·离娄下》，《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 189，四书类。

《孟子·滕文公上》，《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 189，四书类。

《孟子·梁惠王上》，《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 189，四书类。

- 《孟子·尽心上》,《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 189,四书类。  
 《墨子·兼爱》,第十五,《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 154,杂家类。  
 《墨子·鲁问》,《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 154,杂家类。  
 10《墨子·尚贤下》,《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 154,杂家类。  
 11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1 版,第 20 卷,102 ~ 103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12 参见徐震、林成亿著:《当代社会工作》,83 ~ 84 页,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6。  
 13 《论慈善事业中外之不同》,载《东方杂志》,1904 (11)。  
 14 柳治徵:《中国文化西被之商榷》,转引自《新华文摘》,1996 (12),29 页。  
 15 参见王锦塘等著:《美国现代大企业与美国社会》,221 ~ 222 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  
 16 参见张桁:《公司慈善事业——美国大公司的竞争新术》,载《外国经济与管理》,1994 (10)。  
 17 梅小京等:《慈善事业在中国——访中华慈善总会会长崔乃夫》,载《中国青年报》,1995 —10—19。

(作者单位: 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所)  
 (责任编辑: 杨宗传)

核算的规范初探 .....	97.4.92
廖 洪: 加强和改进部门审计的思考	97.4.87
程保平: 关于国有企业资产价值运动中 “价值虚拟”问题的会计学思考	97.5.80

## 十、人口

李 珍: 关于退休年龄的经济学思考	97.1.86
黄 勇: 魁奈人口经济学说述评 .....	97.2.80
杨宗传: 现代社会呼唤发展社会化老年 服务体系 .....	97.5.38
钟水映 张晓东: 发展观下的人口问题 与人力资源开发 .....	97.5.85
张迪祥: 长江流域人口生态与持续发展 问题探讨 .....	97.6.91

## 十一、书序·书评·综述

屈祖荫: 全国社会保险研究会二届二次 年会综述 .....	97.2.92
刘光杰: 《香港经济平稳过渡与经济繁 荣》序言 .....	97.2.94
贺 铿: 《灾害统计学》序言 .....	97.2.96
肖殿荒 田 莉: 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和 实践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西南、西北、中南三大区外国 经济学说研讨会第二届年会综 述 .....	97.3.85

陈恕祥: 《刘光杰选集》序言 .....	97.3.87
沈建英: 研究开发性移民安置方式, 探 索三峡库区经济持续发展的新 作——评《三峡工程移民与库 区发展研究》 .....	97.3.90
卢华根: 国有企业改革的新思路 ——《产出本位公有论》评介 .....	97.3.93
林和中 王永海: 我国成本会计研究的 新突破——《现代成本会计纲 要》介评 .....	97.3.95
帅冬云: 中日经济现代化理论研究的新 探索——简评严清华专著《中 日现代化经济发展思想比较研 究》 .....	97.5.91
徐宝林: 对外开放的理性思考——陈飞 翔专著《开放中的经济发展》 评介 .....	97.5.93
吴联生 余晓红: 借鉴各国审计经验 发展中国审计事业——评廖洪、 余玉苗专著《审计比较研究》	97.5.94
林幼平 张义周 胡绍华: 可持续发展 研究综述 .....	97.6.86

## 十二、其他

李 兵: 计算机软件与社会经济调查	97.2.89
陈 锋: 清初的招民与垦荒政策 .....	97.4.76